

纪念中国共产党

90周年

不能忘却的记忆·特刊



90年前,他们第一次秘密的正式聚会,参与者才13人。28年后,他们推翻了独裁政权,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人民共和国。从赤手空拳到大国崛起,他们几经挫折,他们突围奋进。他们,靠什么赢得天下与民心?

中共能够成功应对面临的挑战吗?

他们,凭什么能?

——中央党校党史专家谢春涛解读中共成功之道

6月18日,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、博士生导师谢春涛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《湖湘讲堂》,坦诚解读“中共的成功之道”。

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,“记忆版”特别推出“不能忘却的记忆”特刊,选摘谢春涛教授讲座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。



1954年,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第一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(草案)》,并就《宪法(草案)》修改问题分别致信刘少奇、胡乔木。

主题问答

问: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?

答:犯错的动机、愿望是好的,是好心办坏事;犯错误期间也有重要的成就;犯了错之后,领导人同老百姓同甘共苦;深刻地总结犯错的教训,换取了巨大的历史进步。

选摘关键词:“文革”与毛泽东、邓小平

◇几年前有一个越南人问我: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起步最早?我说就因为我们发生了一场“文化大革命”,使中国共产党人撞了南墙,撞醒了,撞得头破血流,所以我们义无反顾,纠正了过去的错误,走上了一条新路。

权力斗争只是表面现象

“文革”很复杂,它的起因至今众说纷纭。流传较广的是所谓权力斗争说,说“文革”是中共高层、特别是毛泽东刘少奇之间权力斗争的结果:“大跃进”失败,毛泽东退居二线,威望降低,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,收拾残局。在这个过程中,毛泽东感觉到刘少奇越来越不听招呼,下决心把他打倒,就发动了“文革”。这个解释似乎顺理成章,毛泽东也不掩饰、不隐晦他发动“文革”的直接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,夺他的权。

但是我认为这是直接原因、表面现象。如果用这个解释“文革”,有几个重要问题说不清楚:比如说毛泽东发动“文革”,如果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、邓小平,为什么还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?为什么老干部“文革”初期就被打倒了,“文革”还要持续十年之久?为什么持续十年之久,毛泽东都不罢休,后来又讲,这样的政治大革命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?

另外,毛泽东很长时间内对刘少奇、邓小平非常欣赏,他的不满意是从1962年开始,主要是所谓“三自一包”。为了解决“大跃进”造成的困难,安徽搞了包产到户,效果很好,不少领导人热情支持。刘少奇讲应该起草一个文件全国推开;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,不管黄猫黑猫,捉住老鼠就是好猫,所谓“猫论”就是这个时候、针对这个问题讲出来的;还有中央副主席、国务院副总理陈云,专门向毛泽东建议,推广责任制;还有国务院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邓子恢也写报告,建议推广。毛泽东不同意这些意见。在他看来,党内刮起了一股单干风,越到上层越大,主张包产到户的人,是站在地主、富农的立场上,替他们打主意。“三自一包”在毛泽东眼里,变成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纲领。所以,在他看来,刘少奇、邓小平就成了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为了使党不变修,国不变色,就得把他们打倒,夺他们的权。我认为毛泽东当年就是这样一种逻辑。

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

当然我们今天回头看,这个判断肯定是错的,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判断?我认为缘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。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,固守了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,我概括为四个单一:单一公有制、单一计划经济、单一按劳分配、单一农业集体经营。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,看到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具体弊端,但是这四条,他当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。

再一点,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追求。有三点他特别强调,第一,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能大。他特别反对收入差距太大。第二,强调干部得同老百姓完全平等。他特别怀念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。第三,强调精神上高度纯洁。一出戏,一本书,一部电影,都怕弄出所谓“封、资、修”的东西来。毛泽东这三个方面的理想,我们没有理由说它不好。问题在于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要推行,肯定有阻力。比如收入差距当年小到了近乎于平均主义的地步,肯定调动不了积极性。干部这里有阻力就开始教育,教育半天发现,好像老干部变“修”了,干脆打倒,

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,再提拔王洪文这样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,后来对王洪文失望,因为能力比不上老干部,享乐腐化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对农民也重视教育,每到冬春农闲时节,发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,但教育来教育去,发现农民老是想多养几只鸡,下点蛋,集市上卖掉,买点生活用品。后来一度割“资本主义尾巴”、限制每家每户养鸡的数量,甚至一度关闭集市贸易。用这样的办法实现理想社会,当然不可能。

毛泽东在“文革”之前看到了党内的阴暗面,但他解决的方法错了

毛泽东晚年发现理想社会不是越来越近,而是越来越远。1976年春节,毛泽东的身体已经不好了,他在病中看了一场电影,电影的名字叫《难忘的战斗》,当他看到电影当中,解放军进城受到老百姓自发热忱欢迎的镜头的时候,他放声大哭。哭什么?我认为他是触景生情,联想到他努力追求的理想状态的党群关系、干群关系、军民关系,不光没实现,反而不如建国初,更不如建国前,他的理想跟眼前的现实这个巨大的反差,让他伤感。

所以我赞同1981年中央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里一个基本判断,“文革”对毛泽东个人来讲,是个悲剧。他在“文革”之前看到了党内的阴暗面,比如有的领导干部高高在上,脱离群众,甚至有人鱼肉百姓。毛泽东容不得这个,要解决这个问题。但他方法错了。今天我们看得很明白,要想解决干部不脱离群众的问题,关键靠制度,靠权力监督制约。而当年毛泽东用得更多的是打倒夺权的方法。这样的办法代价太大了,成本太高了,如果权力制约(制度)跟不上,也不可能根本解决这样的问题。我觉得他的失误、他的教训在这,但是愿望是好的。

邓小平爱谈历史,谈的基本上都是犯错误的历史

中国共产党是不回避错误的。特别是“文革”结束之后,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深刻地总结了过去犯错误的教训。大家知道,邓小平的经历很特殊。“文革”中被打倒了两次,这个经历使他在党内对“文革”教训的思考,比别人都多而且深,可以说真正大彻大悟。如果我们翻一翻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三卷,很容易发现:邓小平爱谈历史,谈的基本上都是犯错误的历史。他的很多重要的基本论断,就是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。比如:贫穷不是社会主义;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;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;没有民主法治也不是社会主义。这些都是他的基本判断,用的全都是否定的句式结构。我觉得,都是针对当年的教训、特别是“文革”之中的教训阐发的。

所以我们的错误没有白犯,代价没有白付,换取了巨大的历史进步。几年前有一个越南人问我: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起步最早?我说就因为我们发生了一场“文化大革命”,使中国共产党人撞了南墙,撞醒了,撞得头破血流,所以我们义无反顾,纠正了过去的错误,走上了一条新路。(下转A27版)



1949年9月30日,毛泽东、朱德、贺龙等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上。



土地改革时期,湖南岳阳县策口乡农民烧毁旧地契。



1954年春节,河北省唐山解家套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女孩陈翠翠,正在试穿妈妈刚做好的新衣。



大跃进中,一位小女孩坐在“高产田”里的稻穗上。